

Between Dictatorial and Powerless Monarchy: Emperor Meiji's Decision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Xiao Yifeng^{1,a}

¹School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aidian, Beijing, China

^abee.wai@qq.com

Abstrac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previous studies on Japan's diplomacy and decision-making often focused on the Minister and the Navy. The emperor'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s and deeds in the war was often limited to edicts, edicts, and official propaganda. The real role played in decision-making. So that there are some views that the emperor is not pro-political, but only confirms the opinions of the cabinet ministers.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memoirs and letters to take the two nodes before the Kowshing Incident and the attack of Chihli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real image of Emperor Meiji's decision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Keywords: Emperor Meiji, Sino-Japanese War, Kowshing Incident and

在专制君主与虚君之间： 浅论甲午战争中明治天皇的决策

肖义峰^{1,a}

¹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海淀，北京，中国

^a bee.wai@qq.com

摘要：

甲午战争时期，关于日本的外交和决策，以往的研究常常着眼于重臣和陆海军，而天皇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言行的认识，往往局限于诏书，敕令以及官方的宣传，很难探究其在决策中所扮演的真正作用。以至于有一些观点认为，天皇不亲政，只是对阁臣的意见加以确认而已。而本文将借助回忆录与书信，以“高升号”事件与进攻直隶之前两个节点为例，初探明治天皇在甲午战争中的决策的实像。

关键词： 明治天皇 甲午战争 “高升号”事件

1. 8月11日史料与明治天皇

关于甲午开战时日本的决策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军方和政府重臣的研究，而关于明治天皇在战争中表现的深入探讨则较为匮乏。而日本学者在提及明治天皇对战争的态度时，往往会引用这一条史料：

《明治天皇纪》1894年（明治27年）8月11日条：

十一日，由于进行对清国宣战的奉告祭，早上八点对贤所、皇灵殿、神殿进行装饰，供奉御饌和币物，当时天皇并未起驾，由式部长侯爵郭岛直大进行代拜，并

奉上祝词……

在此之前，公布宣战诏书的时候，宫内大臣子爵土方久元候在御前候着，等候关于向神宫和先帝陵敕使人选的谕旨。天皇说：“这次的战争速来不是朕的本意，既然阁臣上奏说这场战争是不得已之举，朕只是允许了，但向神宫和先帝奉告这件事情，对朕来说实在是苦恼。”土方久元听了之后感到十分惊讶，进言道：“既然已经裁可了宣战诏书，如果您再做出这样的指示的话，实在是太不合适了。”此话突然触及逆鳞，天皇说：“不要再说了，朕再也不想看到你了。”……^[1]

对于这条史料的解释，藤村道生认为“开战外交是在连明治天皇也没有充分同意的情况下，超越了天皇的

意志而进行的”^[2]而信夫清三郎则认为天皇在中日战争的问题上是和平反战的。^[3]

但是在距离这条史料不远处,《明治天皇纪》中便写道: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侍从长侯爵德大寺实则来到了久元的官邸,传达了速速选定敕使的人选奉呈给天皇的圣旨,久元赶快去大内,到御座所见天皇,天皇龙颜极好,与平常毫无二致,直接同意了上奏的内容。^[4]

从以上记载来看,既然明治天皇对于宣战并不排斥,那么该如何理解1894年(明治27年)8月21日的这一插曲呢?宇野俊一认为,天皇作为拥有大权的君主,决定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在其心中引发了强烈的动摇。但这种动摇,是在开展近两个月之后,外交交涉困难、无法充分看清英国和俄国的意图的情况下进行宣战。关于战局的前途,在无法确定地保证能否获得制海权的情况下,肩负着向皇祖皇宗和先帝奉告的责任时的动摇。是毫无经验导致的面对大决断时的恐惧的发言,而事实上根据土方方的描述,在之前的6月24日,天皇还进行了积极地发言,其前后的摇摆不可谓不大。^[5]类似地,唐纳德·恩基认为,由于当时的外国媒体一致预言,一旦日本丧失了遵守纪律和做好战事准备这一最初优势,清国将取得胜利,故当时的明治天皇担心日本不是清国的对手。^[6]

可是如果仅仅依靠《明治天皇纪》这样的官方记载,或许无法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现场,如黄尊、陈德金的《明治天皇与甲午战争》,其中多使用当时的宣传话语,自然只能得到天皇义勇向前,激励将士的结论。^[7]我们有必要通过一些侧面的史料来看明治天皇当时的举动。

在陆奥宗光7月28日给伊藤博文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刚刚炮击了英国旗的船只,由于还没有从西乡那里得到任何汇报,如今能做的只有发函催促。此事关系实在是甚大,且几乎无法推测其结果,我为此忧虑不堪。如果又将其他旅团向朝鲜增发,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循序渐进地进行,但是如果到了清国士兵不来韩地,或者只维持两三千人的少数士兵,我方没有增兵必要的情况下,如果我方再继续增兵,不仅第三国肯定会起疑心,连大院君等人也会起疑惧之念。如果在这期间,清国再进行其他的离间行为,恐怕朝鲜会再次倒向变得以来清兵。此外大院君最大的愿望便是向闵妃一族复仇,并非一定要选择以来清国或者日本之中的任意一方。虽然清国过去一贯支持闵妃一族,但如果形势一变,不会不和大院君保持一致。现在由于大鸟的“指挥棒”,让大院君等非常配合,从最开始就非常依赖我国,此外,细说的话绝对不可让其再和清国有合作的情形。而如果让大院君对我们的举动产生疑虑的话,就会变成鸡飞蛋打、两头落空的情形,实在是太遗憾了。昨天来参谋本部相谈,从釜山开来的船停泊在仁川,接通了电报,向大鸟发送了数通包含种种忧虑的电报,到了昨天晚上到

底还是派了六艘船,在这通讯中断的时候,突然大兵进入韩地,大鸟估计会感到非常困惑,感叹“万事已矣”吧。正在此时,仰仗天皇英断,天皇认为,增发大兵的事情,暂时推迟是不合适的!(大兵增发の義一時見合せ候義相叶う間敷哉)这使我忧虑不堪……^[8]

在高升号事件之后的紧张时刻,陆奥宗光也失去了准确的判断,“此事关系实在是甚大,且几乎无法推测其结果”,日本一方面对于英国的追责十分惧怕,另一方面又怕继续增派军队向朝鲜半岛会造成不利的后果:让第三国起疑心,还有可能使得大院君彻底倒向清国。在陆奥宗光和大鸟圭介都举棋不定的时刻,天皇并未迟疑,决定不推迟向朝鲜增派军队。

那么该如何理解天皇在8月11日的态度呢。根据《日本外交文书》,在高升号事件之后,末松谦澄像政府的报告书中写道:“关于本事件,在万国公法上我浪速舰的行为该如何界定,简单地说,如果说其行为没有失当之处,那么持有公平立场的批评家就不应该有疑惑了”(《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727号文书)。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也发电,报告英国政府认为击沉高升号事件的主要责任在日本(《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724号文书)。据此也就不难理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决策者所面临的处境。同时,在此事之前,陆奥还曾压下了天皇关于进攻牙山暂缓的指示,使得天皇大为不满。^[9]故天皇在向神宫和先帝奉告时产生动摇并且向土方久元大发雷霆,一改7月28日时的激进,可以说是因为对英国干涉的恐惧,对战争前途的不确定以及对阁臣不满的共同结果。

然而这种动摇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很快,明治天皇便开始如常地对战况作出指示,如八月十五日侍从长德大寺实则给伊藤博文的信件:

昨日圣上下了指示,鉴于将来之战况,关于您所提的第二军编成的事情,圣上的指示是现在大本营还没有消息,所以可以取消命令……^[10]

而在八月十三日,在德大寺给伊藤博文的书信中也有提到,天皇对于伊藤博文上奏内容的意见:

您之前上奏的关于向朝鲜国输送三个师团的士兵的事情,由于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有五个师团的兵力而且足够调配,可以将三个师团的兵力调往其他需要的地方,只是由于耗费经费很多,暂缓调三个师团向韩地出兵的事情需要向川上参谋通知,圣上希望您能多多汇报。^[11]

在这两则日记中,天皇都积极地对编成第二军和有关军费的事情做出了直接的指示,都体现出其对战局的直接掌控。正如远山茂树所批判的那样,“天皇不批判论”并不存在,实际上,在明治时期,天皇一直是作为“亲政君主”而存在,并掌握着军事与政治的实权的。^[12]但是,作为“亲政君主”的天皇,在“高升号”事件之后的国际压力下,天皇所表现出的暴躁与不安,以及

在增兵问题上的草率与冒进,我们很难说是一位理性而冷静的指导者。

那么,面对天皇的亲政,明治重臣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2.进攻直隶时的天皇、伊藤与陆奥

1895年3月,日军制定了进攻直隶平原的计划,即“直隶平原决战计划”,《明治天皇记》记载道天皇认为“应当借机亲率大本营移往旅顺半岛,之后再移往洋河口,虽然天皇表达了其意愿,但在有司以健康为理由的大力劝阻下,天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在这一天任命了征清大都督(小松宫彰仁亲王)。”^[13]

明治天皇狂热地支持“直隶平原决战计划”和当时的军队风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陆奥宗光讲:“当时军人社会的气焰,仿佛是不能亲自渡一次黄海的波涛,不能踏一次爱新觉罗家的地,就不齿于与其同列一般”^[14],而此时的明治天皇似乎已经陷入这样一种狂热情绪之中,兴致勃勃地策划自己“御驾亲征”的场面。

但是,战争的走向并未按照天皇的设想发展,事实上,继续进行战争已经是困难重重。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都有自己的想法。

伊藤博文面对进攻直隶的计划,认为“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期战斗之我军队人员,军需固已告缺乏”并表示道:“如果果真如此,达其所望,清国便会变得满洲朝廷震惊、暴民四起,乃至土崩瓦解,成为无政府状态,便是可让中外齐声高唱的结果,尽管我国迄今为止都竭尽全力避免世界各国的干涉,但由于各国保护其商民乃是最关乎利害的事情,必然会到实施共同干涉的地步,如果这样,岂非是自己招致各国的干涉吗?……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清廷仍在犹豫,仍不像我请降的话,便更进一步……乘水陆连胜之余勇,攻陷山海关,进逼天津北京也尚不晚。”^[15]

伊藤博文一方面认识到日军的补给已经逐渐支绌,一方面认为,假如“直隶平原决战计划”成功,导致满清政府垮台,导致中国变成无政府状态,那么便会招致各国的干涉,使得日本自开展以来避免日本干涉的方针功亏一篑,所以对中国应当以劝降为主。

而陆奥宗光的计划似乎要更进一步,正如前文所述,1895年3月上旬,大本营决定实施直隶平原作战,而天皇也表示想要前往旅顺。但是,就在2月初,中国派往广岛的讲和使者,由于缺失全权委任状为由,被日本方面拒绝进行谈判。

关于张荫桓、邵友濂赴广岛进行的此次谈判,以往的研究倾向于认为缺失全权委任状不过是借口,是由于日本方面有意拖延,以期在战场上求得更大利益,加之中国方面准备不足造成等原因造成的。^[16]然而,陆奥宗光在他著名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却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广岛谈判破裂、张、邵两使归国之后,欧美诸国对日清事件的视听变得更加敏锐。拒绝清国使者的事情使他们有了口实,使他们觉得在这之中就算没有阴谋和异心,也充满了不是与讶异,对我国将来的举动有了很深的猜忌之念……故余无论如何也要诱导清政府尽可能早地再派讲和的使臣,尽快停止战斗,恢复和平,使列国视听一新。^[17]

陆奥宗光的《蹇蹇录》在其临去世前作成,之后长期被列为禁书的行列,直到1930年代才允许公开发行,反应了不少明治时期的外交内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陆奥宗光意识到,广岛谈判的破裂极有可能使欧美对日本产生疑心,日本亟需快速结束战斗进入和谈,甚至连春天都不应该等。这与明治天皇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而事实上,也正是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主持了对清朝停战后的谈判工作,战争也并未到“直隶决战”的地步便结束了。

3.结语

中塚明认为,在围绕甲午战争的外交时,日本存在一个“二重外交”的外交体系,一个是以陆奥宗光等阁臣为核心的外交体系,一个是以军队为核心的外交体系。^[18]而明治天皇的态度恰恰和军队的态度相一致,并如前文所述,明治天皇在多处政策上都与内阁大臣发生过龃龉,且其态度亦多有反复。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天皇不亲政论在甲午战争时是不成立的,近臣的日记的书信证明明治天皇会针对战争下达具体命令,而非只是承担礼仪职责。其次,天皇在许多决策上偏向激进,甚至会做出不理智的判断,且其态度易变。最后,天皇的命令虽然有效,但无法真正左右政策,在阁臣反对的情况下,大的方针仍然由总理和外相决定。

在这样一个二重外交体系下,天皇的位置是耐人寻味的,一方面天皇以绝对君主的姿态出现在宪法上,另一方面又像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中倡导的那样,只是一个不同的权力机关,或者或许可以称之为“元老中比较特殊的一个”。虽不是不亲政,但也无法起到关键作用。这种非绝对的地位使得一个作为普通人的天皇在冲动或者动摇时不至于影响大政,但是,这样一种暧昧状态下的体制在甲午战争时,由于枢密院元老都尚在,不会造成“令出多门”的问题,但也埋下了后世政治混乱的隐患。

REFERENCES

- [1]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1973)Records of Emperor Meiji Volume VIII.Yoshikawa Koubunkan,Tokyo.
- [2] Fujimuramichio.(1981)Japan-Qing War.Yiwen Press,Shanghai.
- [3] Shinobu seizaburo.(1988)Japanese Political History:

Volume III. Yiwen Press, Shanghai.

[4]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1973)Records of Emperor Meiji Volume VIII.Yoshikawa Koubunkan.Tokyo.

[5] Uno shunichi.(1990) The Virtual Image and Real Image of Japanese Modern History. otsuki shoten, Tokyo.

[6] Donald keene.(2018)Emperor of Japan: Meiji and His World, 1852-1912.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Shanghai.

[7] Huang,Z., Chen,D.(2002)Emperor Meiji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WenShizhe》,6:129-136.

[8] Ito hirobumi kankei bunsho kenkyukai. (1979) Related documents of Ito hirobumi 7. hanawa shobo,Tokyo.

[9] Fujimuramichio.(1981)Japan–Qing War.Yiwen Press,Shanghai.

[10] Ito hirobumi kankei bunsho kenkyukai. (1979) Related documents of Ito hirobumi 6. hanawa shobo,Tokyo.

[11] Ito hirobumi kankei bunsho kenkyukai. (1979) Related documents of Ito hirobumi 6. hanawa shobo,Tokyo.

[12] Toyama.s.,(1989)The Emperor and the Emperor System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Historical studies,3: 80-87.

[13]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1973)Records of Emperor Meiji Volume VIII.Yoshikawa Koubunkan,Tokyo.

[14] Mutsumunemitsu.(1941) kenkenroku.Iwanamishoten,Tokyo.

[15]Mourning Association of shunpokou.(1944)Ito Hirobumi biography. Toshosha,Tokyo.

[16]Wang,L.,(2011)Research on Zhang Yinhua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Negotiation,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Social Sciences Edition,2:148-153.

[17] Mutsumunemitsu.(1941) kenkenroku.Iwanamishoten,Tokyo.

[18] Nakatsukaakira.(1990)Sino-Japanese War and Emperor Meiji. Historical Journal,186:31-45.